

LUXUN YANJIU

2

1983

雲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

如磐石
周故園
寄意寒

魯迅研究

屠

軒
輓
時
五十一歲時

鲁迅研究

1983年第2期

目 录

短 评

- | | |
|-------------|----------|
| 应该重视鲁迅研究的研究 | 田本相 (3) |
| 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 | 孙玉石 (6) |
| 学鲁迅的为人 | 朱 正 (11) |
| 从出版角度看鲁迅研究 | 一 言 (14) |
-

作家谈鲁迅

- | | |
|---------|----------|
| 杂忆读鲁迅的书 | 马 烽 (17) |
| 我爱鲁迅 | 苏叔阳 (21) |
-

论文

- | | |
|---------------|-----------|
| 略论鲁迅杂文的情理趣 | 甘竞存 (26) |
| 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情感态度 | 许怀中 (44) |
| 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 闫庆生 (62) |
| 鲁迅宗教观初探 | 郑欣淼 (78) |
| 鲁迅小说“白描”说的异议 | 王嘉良 (94) |
| 论鲁迅与胡适的“历史联系” | 黄艾仁 (109) |

继承鲁迅精神

- 论鲁迅的共产主义精神 史 莽(118)
在越剧舞台上塑造鲁迅形象 上海越剧院 刘 觉(131)
-

作品欣赏

- 《孔乙己》的思想深度与美学力量 刘再复(136)
悔恨和悲哀的歌——读《伤逝》 陈遇春(144)
-

学人采访

- 访唐弢 本刊记者 王骏骥(153)
-

鲁迅与当代青年

- 值得重视的思考
——简评《鲁迅研究》青年征文座谈会 王 缓(161)
北京文科院校部分学生座谈会综述 本刊记者 王缓(163)
-

青年征文——我所理解的鲁迅

- 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七九级学生 李 丽(168)
谈谈鲁迅的“骂人” 北京大学一分校学生 魏 琦(170)
-

青年园地

-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李 志(175)
论“五四”时期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
陕西师大八一届学生 高 杰(180)
补白
答关于《鲁迅日记》杂问若干 锡 金(190)
-

封面设计

曹辛之

鲁迅研究

1983年第2期

目 录

短 评

- | | |
|-------------|----------|
| 应该重视鲁迅研究的研究 | 田本相 (3) |
| 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 | 孙玉石 (6) |
| 学鲁迅的为人 | 朱 正 (11) |
| 从出版角度看鲁迅研究 | 一 言 (14) |
-

作家谈鲁迅

- | | |
|---------|----------|
| 杂忆读鲁迅的书 | 马 烽 (17) |
| 我爱鲁迅 | 苏叔阳 (21) |
-

论文

- | | |
|---------------|-----------|
| 略论鲁迅杂文的情理趣 | 甘竞存 (26) |
| 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情感态度 | 许怀中 (44) |
| 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 | 闫庆生 (62) |
| 鲁迅宗教观初探 | 郑欣淼 (78) |
| 鲁迅小说“白描”说的异议 | 王嘉良 (94) |
| 论鲁迅与胡适的“历史联系” | 黄艾仁 (109) |

继承鲁迅精神

论鲁迅的共产主义精神

史 莽(118)

在越剧舞台上塑造鲁迅形象

上海越剧院 刘 觉(131)

作品欣赏

《孔乙己》的思想深度与美学力量

刘再复(136)

悔恨和悲哀的歌——读《伤逝》

陈遇春(144)

学人采访

访唐弢

本刊记者 王骏骥(153)

鲁迅与当代青年

值得重视的思考

——简评《鲁迅研究》青年征文座谈会

王 缓(161)

北京文科院校部分学生座谈会综述

本刊记者 王缓(163)

青年征文——我所理解的鲁迅

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人

北京师范大学七九级学生 李 丽(168)

谈谈鲁迅的“罵人”

北京大学一分校学生 魏 琦(170)

青年园地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李 志(175)

论“五四”时期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

陕西师大八一届学生 高 杰(180)

补白

答关于《鲁迅日记》杂问若干

锡 金(190)

封面设计

曹辛之

应该重视鲁迅研究的研究

田本相

以去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涌现出一批专著，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一个较大的进展。在这样大好形势面前，面临着一个如何进一步提高鲁迅研究的水平问题。的确，象人们评论的那样，今后鲁迅研究是更为艰苦些了，要想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就尤为困难。当然要把鲁迅研究推向新的水平，这需要许多工作，而当前急需重视的一个任务，就是应当加强鲁迅研究的研究。也就是说，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认真总结鲁迅研究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探讨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指示鲁迅研究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不但对于当前鲁迅研究来说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对于鲁迅学科的建设也将有着深远的意义。我就此谈一点随想和倡议。

首先，应该加强对鲁迅研究现状的研究。打倒“四人帮”之后，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著。对于这个历史阶段的鲁迅研究成果应给予认真的研究和总结，举例来说，只就鲁迅研究专著来说就有八十种，它涉及鲁迅的生平，思想（包括政治、哲学以及美学、文艺思想）、小说，散文等各个方面，它们体现当前研究的最新发展水平。令人遗憾的是，虽有一些评介，但多数专著甚至一些颇具学术水平的专著受到冷淡。这种情形同鲁迅研究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我

以为对这些专著只是一般的评介还不够，还应有专门研究它们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应是高瞻远瞩，卓有识见的研究，它不但对这些专著作出评价，更应该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高度上，分析其得失经验，提出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于此，更需要对同类专著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揭示出它们达到的和未曾达到的，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课题加以讨论。如鲁迅传记、鲁迅思想研究，鲁迅小说研究都有几种专著，倘能综合研究，写出一些有分析有探讨的文章，必将使人开阔视野、深入思索，引起人们深入探索的兴趣。我想，鲁迅学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从鲁迅学自身发展的长期考虑出发，应加强鲁迅研究的研究，正如文学批评是推动创作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那么鲁迅研究的研究则是推动鲁迅研究向前发展的重要方面。

应该倡导鲁迅研究的研究和评论，特别是鲁迅研究的刊物，更应该有计划地有重点地抓住某些迫切的课题组织文章。甚至象鲁迅研究的年度述评、各种体裁研究的述评以及问题争鸣的介绍等，都是会受到欢迎的。

其次，应该重视鲁迅研究的历史经验的研究。鲁迅研究的历史，大约至少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六十多年来，鲁迅研究领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对鲁迅研究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人着手进行，但仍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一方面，鲁迅研究自身的历史已经可以独立起来，构成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为了当前和未来的鲁迅研究的发展，也必须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知古而鉴今，由历史可指示未来研究的途径。如杂文研究，大家都承认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方面，怎样才能把鲁迅杂文研究引向深入。倘能有人从鲁迅杂文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必将给当前鲁迅杂文研究者以深刻启示。当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鲁迅研究的好的方法和经验，更应当发扬六十多年来鲁迅研究中的优秀的历史传统。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过去不是总结太多而是太少了，我认为认真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鲁迅研究的历史经验，必将使今天的鲁迅研究引向一个更自觉更高级的阶段，使鲁迅研究的优秀历史传统精神发扬光大，使其历史经验在今天得到继承和

发展。如打倒“四人帮”之后鲁迅研究出现的大好局面，就是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正视了建国以来鲁迅研究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结果。

最后，关于鲁迅研究中的方法论也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事实证明，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导致研究的深入和突破。孤立地研究鲁迅带给人们的教训是太深刻了，形而上学的猖獗给鲁迅研究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影响，列宁指出：“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合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发现。”那种把鲁迅同他所联系的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诸方面（包括政治思想、社会生活、文化学术、文学艺术等）的生动而深刻的关系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对鲁迅及其著作作出具有真理性的探讨的。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许多研究者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新的方法摸索新的途径，把鲁迅放在广泛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加以研究。对于这些新鲜的经验和新的方法的探索应给予重视和研究。这对于提高鲁迅研究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者对研究的方法的探索不能代替鲁迅研究的方法论的研究。如近几年逐渐为人采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就应当加以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加以引导。鲁迅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就其根本方面来说，是一个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水平的问题，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把鲁迅研究的水平提高起来。

以上纯属个人之随感，也可以说是呼吁，倘能引起对鲁迅研究的研究的重视，也就算尽了这篇短文的任务。

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

孙 玉 石

近来读了一位鲁迅研究前辈的文章，题为《鲁迅不是象征主义者》，其中开头便写道：“听说，有位同志说鲁迅先生是象征主义者，有些同志在附和，算是研究散文诗《野草》的结论。《野草》在《鲁迅三十年集》的三十种中是最薄的一册，即使这真是象征主义的作品，也不应该单凭《鲁迅全集》中这最小的一部分，就以偏概全地断定作者是象征主义者。”这段话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批评方法本身却值得研究。

我是喜欢《野草》的，又发过一点有关《野草》与象征主义创作方法关系的极不成熟的谬见，并因此注意浏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我准备随时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从而修正一些谬误的观点。但事实却与前面文章那些判断不尽相同。据我所知，一些研究文章大都仅仅就如何认识《野草》的创作方法这个纯为学术性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至多不过涉及到如何认识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创作的艺术方法多样性的问题，从未看到谁人单凭一本薄薄的《野草》就得出过“鲁迅先生是象征主义者”这样“以偏概全”的“结论”来，当然也就更谈不到“有些同志在附和”了。

我以为，对于一种新的学术见解，即使是十分错误的学术见解吧，应该有所了解才能进行讨论和驳难。相反，不是依据亲见，而是单凭“听说”，不是在实际存在的分歧焦点上去进行理论探讨，而是设定一个子虚乌有的错误论点，或把对方的意见引向荒谬的结论，再

来进行辟谬，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无益于鲁迅研究工作更富于创造性的开展和深入。

由此而想到鲁迅研究中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名曰科学学。它的奥义是什么，我们外行人一下子很难说得清楚。但这门学科创建的浅明而实在的宗旨之一，却似乎可以让我们引为借鉴，那就是：怎样尽量减少各学科研究领域中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以便推动各部门的科学研究更迅速地向前发展。鲁迅研究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要得到更深入的发展，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科学的研究必须有科学的方法。我们鲁迅研究工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为武器，有百家争鸣的健康的学术空气，有研究者们富于独创性的探索精神，就获得了不断向前发展的保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同样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独创性、科学性，同样不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鲁迅研究有理论工作和史料工作。就理论研究方面来讲，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运用理论的科学化。

鲁迅浩瀚的遗产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财富。研究鲁迅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鲁迅的精神遗产相结合的过程。鲁迅研究发展的历史说明，我们研究的水平是与研究者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密不可分的。理论运用的方法往往又制约着我们用理论解决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如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现象，近年来不少文章在进行分析探讨。为了说明国民性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大都引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说的每个民族都有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一段话做为理论上的根据。一种趋于轻便的习惯驱使我们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引述和论证方法，并由此而得出国民性几乎是马克思主义也承认的一个概念，鲁迅后期仍然正确地坚持了这一思想，乃至今天还有一个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至于斯大林的那些话，应当怎样理解，是针对什么而发的，有什么样的理论规定性、人们却往往忽略了。斯大林这篇受到

列宁高度评价的论文，是针对当时高唱“‘民族问题’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浪潮而发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日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针对这种情况，斯大林提出了民族的定义。他所说的每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或“民族性格”是因历代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而且主要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特点上，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的特征，它当然与一个民族内部精神的优点和劣根性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同一篇文章中，斯大林就论述了由于内部的原因，即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正在消失，谈到了资产阶级吸引无产阶级到民族运动中去而打着“全民的”的旗号的虚伪性。他所说的民族心理素质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说的“奴性”“懒惰”等“国民性”或“民族性”显然并非一回事。一九三二年发表的《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斯大林针对这种错误的观点曾经明确说过：“欧洲有很多人用旧眼光来看苏联人，以为生活在俄国的人，第一是驯服的，第二是懒惰的。这是过时的和根本不正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从俄国地主开始跑到巴黎，在那里挥霍掠夺来的金钱，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的时候起在欧洲形成的。这的确是些没有意志和毫无用处的人。由此就得出了‘俄国人懒惰’的结论。但是这同过去和现在都靠自己劳动来谋得生活资料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毫不相干。”怎样认识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一个学术上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在研究中如何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这又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很严肃的艰苦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种科学的方法。

第二、引证材料的科学化。

面对大量的材料需要用理论去说明，一些客观存在的材料又要有科学的理论去概括。这个过程中，对于材料的择用、取舍就有一个科学方法问题。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而那种唯我所用、避难就易的方法则是违背科学的方法。如这两年发表了不少讨论《阿Q正传》的文章，其中不少作者依据鲁迅自己的说明，论证作者描写阿Q这一形象的意图是要画出一个“国民的灵魂”，进一步得

出这是一部批判“国民性”的作品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大都引用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关于“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的一段话。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不少文章对鲁迅下面这些话却往往略而不述：“现在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从鲁迅的自述来看，他所谓的画出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是与那些被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的百姓，那些无法开口的“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显然是相通的。鲁迅这是指的国民灵魂并非一般的国民性，是很明显的。离开这些，仅仅引述一部分话，然后便断定鲁迅写阿Q的目的就是描写批判一般的国民性，这样论述起来，自然减少了许多困难，但因此也就很难算是一种令人心服的科学论述方法了。我们在引述材料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不应随心所欲，不能唯我所用，也不能避难取易。一些争论多年的复杂的文艺现象，是不能依靠避难就易的方法而轻易得到解决。迎着难处上，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难题，才能产生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第三、论述方法的科学化。

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研究工作纳入一种科学的轨道，就应该使自己的研究论述放置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这应该包括的内容很多，力求做到论述的统一性和历史感，就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论述统一性，就是我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不能自相矛盾。如有的文章引用马克思的有关著作，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国民性这一概念的，证明民族性的提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大量材料说明鲁迅后期继续研究国民性；但又说鲁迅后期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已经更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样，前期对国民性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又不尽是唯物史观的认识；国民性民族性的提法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二者的论述怎么统一起来呢？所谓历史感，就是避免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孤立地去评述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前些年存在的神

化与拔高鲁迅的现象，除了政治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原因。而后者，在今天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譬如对于鲁迅早期的一些思想主张，倘若不通过大量的历史的调查和比较，把鲁迅放到当时的时代潮流里去分析，就往往会做出不符合实际的评价来。有的文章谈到鲁迅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启蒙主义思想，认为这一战斗呼啸，有如突进的狂飙，给近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想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把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样的评价恐怕是缺乏历史感的结论。瞿秋白谈到鲁迅这些文章的思想时，既深刻地指出了它们天才的预见性，阐明了这些文献在回答当时思想界对待群众落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时所表现的不同凡响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正确地说明了这些文章的历史作用，他说：“在那时候——一九〇七年——他的这些呼声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如果不是《坟》里保存了这几篇历史文献，也许同中国的许多‘革命档案’一样，就这么失散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比较一下，恐怕这些论述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如果我们在论述中，不忘记作一点历史的比较，不忘记把鲁迅放在当时的历史潮流里去考查，不忘记把鲁迅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区别开来，总之，不忘记用历史的眼光来衡量鲁迅，而不是用鲁迅的眼光来衡量历史，就会使我们的论述更符合实际些，也就更科学些。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地面临着如何全面开创鲁迅研究新局面的艰巨任务。研究一点鲁迅研究的方法，对于打破这个领域里的某些停滞状态，促使它迈向新的水平，应该说是无不裨益的吧。

学鲁迅的为人

朱 正

我的小册子《鲁迅传略》修订本行将脱稿之际，想请孙用同志给它写一篇序言。开始他曾经打算写的，后来因为感到视力衰退，书写困难，推辞了。他写信给我，说明没有能作序的原因，末了说：“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他出了那么多书，从来不请别人作序。”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他曾经为许多后辈的书写序。”我感到愉快的是，他虽然没有作序，但是题写了书名，为小册子增添了光彩。那时我住在长沙，和孙用同志常有书信往来，现在特地提到这一次通信，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你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榜样”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本来嘛，“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学了就是为了要照着做嘛。

从来就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学习态度，一是学了就要身体力行，一是学了不过装点门面。这里说的“从来”，至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的荀况就在他的《劝学》篇中描写了这两种态度。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荀子赞扬了那种“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的学习态度，反对了那种“入乎耳，出乎口”的学习态度，他嘲笑说，这样“入口”和“出口”的距离太短，刚进来就出去了，怎么可能使你这么大一个躯体受到影响呢？

就说鲁迅研究吧。其实也是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的。现在

的鲁迅研究者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出于对鲁迅的由衷的尊敬才开始自己的研究的。他们认为，鲁迅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他毕生追求祖国的进步和富强，他疾恶如仇，不能容忍任何反动的、荒谬的东西，他勇敢地探求真理，坚定地坚持真理，决不随风倒，他极端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研究他，就是研究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史、革命史和思想史，就是他的立身行事，许多地方都足以作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率 and 楷模。许多研究者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和动机来研究鲁迅，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动机使他们的研究富有成果。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研究者的态度都是这样的。鲁迅曾经说过，孔夫子“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历史也真太会捉弄人了，在一段时间里，鲁迅本人竟也当上了这“敲门砖”的差使。一些人的弄起“鲁迅研究”来，只不过是想用这块砖头去敲开幸福之门。对于这些敲门者来说，其实是无论哪一块砖头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对于这块砖头的本身并没有多少研究的兴趣，需要“研究”的倒是这不同时期的“幸福之门”的不同结构和不同敲法。所以，鲁迅可以“批林批孔”，鲁迅还可以“反击右倾翻案风”，鲁迅提出的“打落水狗”就是教导我们“把反对走资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月，在陈伯达把持下的《人民日报》甚至在社论中说要像鲁迅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比方说吧，一九三六年的两个口号之争，本来不过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一场论争，等到林彪委托江青开了一个什么座谈会之后，马上出现了许多文章说这是一场“路线斗争”乃至“阶级斗争”了，“国防文学”成了资产阶级的口号，什么“卖国文学”啦，“一支毒箭”啦，“不容休战”啦，等等等等。待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马上又有“研究者”连忙声明：我是国防文学派。我为这位“研究者”惋惜的是：稍微生得晚了一点，没有能够赶上一九三六年的那一场热闹的论战。现在这场论战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我们把它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加以科学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当然是有益和必要的，但自己又怎么可能投身到历史上的这一场论战中去呢？现在谁也不会请纓赴敌，决心帮助关云长守荆州

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笑谈，醉翁之意不在酒，知道了其目的在于敲开幸福之门，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只有一个“观点”是真实的，就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敲开幸福之门，此外并无任何自己坚信的“学术观点”。如果他判断作相反的表态更有利于敲门，他也可以向东吴输诚，帮助陆逊来打关羽了。鲁迅曾经描写过这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像风信旗似的转得真快”。

鲁迅曾经给流氓下过一个这样的定义：“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④297）这些“研究者”看了鲁迅的这段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学术研究是极为严肃的事情，要求人们认真从事的。试看鲁迅，他是经过成年累月的准备，才写出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来，而且一再订正它的差错。就是翻译，有时为了一个译名定不下来，反复写信和人商量。而有些鲁迅的“研究者”却不肯这么办。因为意在敲门，所以花如许气力就未免不合算了。“克日速成”的煌煌巨制，洋洋百十万言，论体积乃至重量等相当一块真正的砖头，可是其草率粗陋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朱家骅（骅先）可以变成《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留仙）！还有些人对于捏造“史料”有不疲倦的兴趣，而且愈造愈大，就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的头上都造起谣言来了，说什么他曾经去访问过鲁迅。还有些人为了发表“成果”，可以不择手段。首先是诱之以利，倘若给我发表，你的英名必将载入〔我的〕史册。这一招要是不灵接着还可以胁之以威，我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

正如鲁迅说的，一些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带累了孔夫子。一些人把鲁迅当作“敲门砖”也给鲁迅带来了损害。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用确凿的材料和有说服力的论文告诉现在这一代青年读者，鲁迅并不是那些把他当敲门砖的人描画的样子。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

从出版角度看鲁迅研究

一 言

去年，为了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各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批鲁迅研究著作，论题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的。百年诞辰纪念盛会之后，在新的一年里，鲁迅研究著作的出版，仍有继续发展的势头，除《鲁迅研究》、《鲁迅研究资料》以及各地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论文集而外，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李何林主编的《鲁迅年谱》第一册，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先后问世，彭定安撰写的《鲁迅评传》、王得后撰写的《〈两地书〉研究》、

（上接13页）

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①

马克思声明自己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这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鲁迅泉下有知，当也会向这些把他当作敲门砖的“研究者”作类似的表态吧。

一个人想要敲开“幸福之门”的愿望是未可厚非的。愿意拿鲁迅来做这“敲门砖”也可以算是鲁迅的“荣幸”。不过，你是不是也可以多少用一点诚恳的心来研究一下手上的这块“砖头”？既然你已经读了不少鲁迅的书，那么也学一学鲁迅的为人，行不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七卷，中文版第446页。